
「道」與「文」

——論《文子》的論證特點*

費安德 (Andrej FECH)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陳竹茗譯

本研究旨在展示如何通過斷簡殘篇中所見的論證特點，對原始文本的內容和結構取得更全面的認識。道家典籍《文子》現存兩個版本，即傳世的今本及1973年河北定州出土的西漢簡本《文子》，由於兩者存有不少差異，並同樣經過竄改及殘缺不全，因此尤為適合本研究之用。本文首先探討《文子》與重見於其他中國早期文獻的文字，不單證明《文子》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和《荀子》的影響，為其創作時代提供了旁證，更揭示某些論證特點的重要性；當中以「反義平行」(antithetical parallelism)最為突出，本文的著眼點即在於利用此一修辭手法嘗試重

「道」與「文」——論《文子》的論證特點

* 本文部分建基於作者的博士論文，論文則於2012年修訂成書出版。見 Andrej Fech, *Das Bambus-Wenzi: Versuch der Rekonstruktion des philosophischen Standpunktes eines daoistischen Textes der Frühen Han-Zei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2). Pp. 363.

構一組原始文字。再者，本文提出的反義平行雖在《老子》等中國早期文獻裡廣泛使用，但仍能找到證據表明《文子》採用這種論證手段是師法《荀子》。在《荀子》一書中，「反義對舉」(antithesis)是構成「文理」論述的重要元素，最終目的在於反照周初先王的文化遺產——「文」。「文」這個概念在《文子》中亦極為重要，是道家的核心思想「道」得以完滿實現的標誌，惟其重要性往往被人忽略；有鑑於此，結論部分提出《文子》跟《荀子》一樣，試圖貫通其哲學學說的內涵和文本表現的形式。

關鍵詞：《文子》 互文性 反義平行 《荀子》 《老子》

引言

1973年，河北省定縣（1986年撤縣，改為定州市）八角廊村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了竹簡《文子》（下稱簡本《文子》），¹ 本文即旨在重構其中一部分論證特點。《文子》在漢代被目為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作者相傳為文子，是漢代人心目中與老子關係最親密的弟子。² 是以重構和分析《文子》的論證結構有幾方面的重要意義，最明顯的得益是通過分析一個文本的論證策略和形式結構，有助我們更全面理解寫作的動機和意義，這點已日益獲學界肯定。³ 再者，此一分析亦可以揭示早期道家宣揚者發展出的遊說技巧在哪些方面與《老子》相符，要知道《老

1 有關是次出土發現的詳情，參見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年第8期，頁11-13。

2 王充（27-97）把老子和文子的師徒關係比擬為孔子與其愛徒顏回（前521-481）：「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見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783。

3 麥笛（Dirk Meyer）提出：「在生成意義時，一個文本的形式結構顯然是詞彙層面以外至為關鍵的要素。」見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 50。耿幽靜（Joachim Gentz）認為：「在很多情況下，一個文本的論證文句需要通過重構其文學編排，方能毫不含糊地加以重構，因其文學編排體現和融入了整個論證。」見Gentz, “Defining Boundaries and Relations of Textual Units,” in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eds. Joachim Gentz and Dirk Meyer (Leiden: Brill, 2015), 133。

子》主要利用比喻來體現其中心思想——不可言喻的「道」。⁴

我在談論簡本《文子》時採用重構（reconstruction）一詞，是因為西漢末年盜墓者刻意起火或不慎失火，令這部文獻跟其他定州竹簡一樣遭受嚴重毀損，倖存的斷簡被燻黑碳化，簡上墨跡只能在某個角度下辨識。⁵ 其後，蒐集得來的斷簡於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再遭毀損，次序淆亂。因此簡本《文子》的現存狀態過於零散不全，連對原書結構及其哲學內涵作一最基本的評價也做不到。⁶ 然而，簡本《文子》有別於大部分定州竹書，尚有一個傳世文本

4 有關《老子》書中比喻的分析，參見 Sarah Allan, *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中譯本見艾蘭著，張海晏譯：《水之道與德之道——中國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Allan, “The Great One, Water, and the *Laozi*: New Light from Guodian,” *T’oung Pao* 89.4–5 (2003): 237–85；Edward Slingerland 森舸瀾, *Effortless Action: 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Hans-Georg Moell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Daodej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譯本見漢斯一格奧爾格·梅勒著，劉增光譯：《道德經的哲學——一個德國人眼中的老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Andrej Feč 費安德, “Spatial Concepts in the *Laozi*: a Contemporary Metaphor Theory Perspective,” *Berliner China Hefte* 46 (2015): 43–57。

5 劉來成：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文物》1995年第12期，頁38。

6 同上注。

流傳下來。⁷ 儘管對《文子》兩個版本所作的比較顯示，文本在流傳過程中經歷頗為重大的改動，包括人物、概念範疇、文章結構和哲學觀點等，⁸ 但鑑於出土文本高度零散，傳世本仍具有非常可貴的參考價值。

出土《文子》的部分重要論證特點已有學者論及，例如葉波（Paul van Els）在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該文本的對話結構和經常使用定義的做法，可以比擬「用問答方式概括基督教義理的『教義答問』（catechism）」⁹ 他認為，主人公文子的定義式應對代表「其所持觀點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客觀定義，因而是對所談概念唯一可能的詮釋。」¹⁰

7 據鮑則岳（William G. Boltz）估計，「有傳世文本的出土文獻與沒有的比例大約是1比10。」見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52。由於過去十年大部分已出土和出版的文獻都沒有傳世版本，這個比例自2005年以來沒有增加多少。

8 今本《文子》十二篇中，只有第五篇「道德」的部分章節重見於簡本。兩個文本之間究竟經過多少重構和重編程序實在難測，因為傳本編纂者在過程中的參與固然明顯，但劉向（前79-8）、劉歆（前46-23年）父子在校錄皇家藏書時亦完全有可能對文獻的原本結構作大幅度改動，《荀子》即為顯例（參見劉向《孫卿書錄》）。有關劉氏父子在重構《荀子》時的參與，見 John Knoblock 王志民,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94), 3:271-74。

9 Paul van Els, “Persuasion through Definition: Argumentative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Wenzi*,” *Oriens Extremus* 45 (2005/06): 220.

10 同上注。

然而我在下文將提出，文子在說服對話者平王他的哲學觀點合理可從時運用了不同策略，而定義不過是其中一種，儘管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一段推展相當複雜的論證便常常以定義開始。我尤其不同意葉波的說法，認為「該文本總是使用正面定義（positive definitions），說這個詞是甚麼，而不會說它並非甚麼。」¹¹ 我將證明反面定義（negative definitions）及否定式論證是這個文本最突出的特點之一。

我會先討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問題，原因是一方面《文子》所引用的文字範圍之廣著實令人注目，另一方面選擇取資於甚麼文獻來源，本身就是作者論證策略最根本的步驟之一。此外，所有引文都有獨特的推論結構，最終成為目標文本的一部分。我將指出在簡本《文子》與其他文獻共通的段落裡，有一個特點尤其顯著——「反義平行」（antithetical parallelism）。這一點清楚交代後，我將示範如何利用反義平行這種修辭手段，重構傳世本出現前的原初文本結構。結論裡，我會嘗試解釋具體的論證選擇是否、及如何與文本的哲學相關。

一、《文子》的互文性問題

要討論這個問題，傳世本卷五 道德 篇最後一節應最為合適，因為它是全書唯一一段以文子和平王對話構成的章節。為便於分析，我用英文字母標示出不同語段

¹¹ 同上注，頁 234。

單位：¹²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

A	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 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
B	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
C	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
D	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
E	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 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¹³

以上平王和文子的對話談到國君如何治理天下這個大難題，而在進入互文性重文的探討前，可以先指出這種對話框架並非《文子》所特有。同類對話（主要是虛構）在先秦和漢初子書中屢見不鮮，¹⁴ 不過有些文獻跟《文子》特別相近，如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十大經·果童》云：

12 按：用框標出的字句重見於簡本《文子》，下同。

13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25。

14 譬如銀雀山殘簡「虛設」了不少君臣的相遇，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169-180。

黃帝問四輔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為之若何？果童對曰：不險則不可平，不謹則不可正。¹⁵

傳說中的黃帝孤身一人君臨天下，希望「畜而正之」，於是向四輔請教，並用平王詢問文子的語氣道出他的窘境。話說回來，我們可以從文子的應答中拈出幾個主題單元。首先（單元 A）談到君主作為臣下儀表的作用；其次（B）提到蓄積道德（本書的中心思想）的必要；第三步（C）指出積道德如何能獲致更「高等」的自然力量，如天、地、鬼神、鳳凰和麒麟等前來相助；接著（D）說明人民對統治者的看法取決於後者是否以道治天下；最後文子以史為鑑，印證他的說法確鑿不移（E）。

以上五個單元幾乎都可以在其他文獻找到重文。文子在單元 A 的論點即君主是天下萬民的表率，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見於《荀子》不同的段落，如 疆國 及 正論 篇的兩句：

且上者，下之師也。¹⁶

15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66；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241。《黃帝四經·十大經·成法》亦有相似的對話情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頁72。

16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05。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¹⁷

同一單元的下句與《孟子》和 緇衣¹⁸ 的句式相似，如《孟子·滕文公上》說道：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¹⁹

單元 B 談及「積」的問題，首兩句與《黃帝四經·十大經·雌雄節》某句類近：

故積德者昌，〔殃〕積者亡。²⁰

其後的部分重見於《荀子·勸學》及《大戴禮記·勸學》，²¹

17 同上注，頁 321。

18 緇衣 一文至少有三個版本，包括收入《禮記》的傳世文本、郭店楚墓竹簡本及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本，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曾比較三者的異同，見 Shaughnessy,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64-130。緇衣 中與《文子》相近的文句為「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見夏著，頁 104。

19 朱熹：《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 253。

20 《馬王堆漢墓帛書》，頁 70；陳鼓應：《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頁 271。

21 《老子》中的對應部分，見何志華、朱國藩、樊善標編著：《文子 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156。

其中《荀子》作：²²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²³

接著單元 C 開篇的話可在不少文獻中找到相近文句，如《管子·形勢解》云：²⁴

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²⁵

隨後對於天人和諧的治世描寫更是屢見不鮮。我們可以從《呂氏春秋》、²⁶《孔子家語》、²⁷《史記》、²⁸《說苑》²⁹ 等著作中找到類似的句式，在《淮南子》更是一再出現，像用這

22 《荀子》和《大戴禮記》中的 勸學 篇有不少相同的段落，至於孰先孰後，王志民的研究認為《大戴禮記》本一律是二次文獻，見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1:125。不過這個結論無助釐清《文子》與二文的關係和性質。

23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7。

24 銀雀山竹簡中的 五議 篇亦有相近文句：「天地與之，鬼神相助。」見《銀雀山漢墓竹簡（貳）》，頁 141。

25 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173。

26 應同：「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割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683。

27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28 冊，卷十三，頁 21a。

28 《史記》，卷四七，頁 1926。

29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卷十三，頁 2b。

樣的文句形容黃帝治下的世道：

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³⁰

單元 D 首兩句與《老子》今本六十及六十五章幾乎同出一轍，其中《文子》襲用六十五章的文句較接近西漢帛書本，故以下引用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 德經：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同今本六十章）
故以知（智）知（治）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同今本六十五章）³¹

緊接其後的「文本構件」（詳下）提出人君不應與天下為讎，與下引《韓非子·解老》有明顯的共通之處：

眾人多而聖人寡……，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³²

30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478。

31 兩條引文均見《馬王堆漢墓帛書》，頁 5。《老子》今本六十五章與帛書本的主要分別在於：今本中「賊」的對文為「福」，而構成第一和第三句對立關係的否定詞「不」則放在「以」之前，出土文本及《文子》則無一例外置於「知（智）」之前。今本文句見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68。

32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38。

這段重文尤其有意義，因為它出現於《韓非子》和《文子》作者對《老子》所做的解釋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文子》這幾句似乎與《老子》六十四章相通，而在解老裡，相關文句則用來解釋五十八章「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一句。

文子在總結時引古為證，為他的訓誡提供事實根據。不過上舉例子一樣，「他」的言辭跟不少中國古代文獻大同小異，如《淮南子·主術》云：

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³³

將兩個版本的《文子》和上述文獻對照並列，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

表一：傳世本、簡本《文子》
及其他中國早期文獻的重文比較

		傳世本《文子》	簡本《文子》 ³⁴	其他文獻
A	1.	人主者，民之師也；	2208「之師也， 上者，下之義法 也。」	主者，民之唱也；
	2.	上者，下之儀也。		上者，下之儀也。 (《荀子》)
	3.	上美之，則下食之；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另見 緇衣)

33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95。

3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 年第 12 期，頁 27-34。釋文內的直角引號只用於標示竹簡的相應段落，前面的四位竹簡編號則是出土過程中所分配。

		傳世本《文子》	簡本《文子》	其他文獻
	4.	上有道德，	0575「德，則下	
	5.	則下有仁義，	有仁義，	
		下有仁義，	下有仁義，	
		則無淫亂之世矣。	則治矣。」	
B	6.	積德成王，	0737「〔曰〕：積	故積德者昌，
	7.	積怨成亡，	怨成亡，	〔殃〕積者亡。（雌雄節）
	8.	積石成山，	積」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
	9.	積水成海；	2315「天之道也，	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10.	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	不積而成者寡矣。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大戴禮記》）
	10½.		臣〔聞〕」	
C	11.	積道德者，	0569「有道之君，	
	12.	天與之，	天舉之，	鬼神助之，
	13.	地助之，	地勉之，	天地與之……。（《管子》，另見 五議）
	14.	鬼神輔之；	鬼神輔」	
	15.	鳳皇翔其庭，		鳳凰翔於庭，
	16.	麒麟遊其郊，		麒麟遊於郊……。
	17.	蛟龍宿其沼。		（《淮南子》，另見《呂氏春秋》、《史記》）
D	18.	故以道蒞天下，		故以知知邦，
	19.	天下之德也；	2442「之德也；	邦之賊也；
	20.	無道蒞天下，	以毋道立者，	以不知知邦，
	21.	天下之賊也。	天下之賊也。	邦之德也。（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
	21½.		以〔六曰君〕」	
	22.	以一人與天下為讎，	0579「一人任與	眾人多而聖人寡……，
			天下為讎，	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
	23.	雖欲長久，不可得也，	其能久乎。	非全身長生之道也……。（《韓非子》）
E	24.	堯舜以是昌，	此堯」	堯舜所以昌，
	25.	桀紂以是亡。		桀紂所以亡者……。（《淮南子》）

如上所示，傳世本的廿五句中只有第 4-5 行在其他文獻中找不到相應文句；不過，《文子》與相關文獻的合度和性質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每個單元的情形都不一樣。一部分文句與重文幾乎完全一樣（第 1-2 行），另一部分則可能經過改寫和調整（第 3、8-10 及 22-23 行）。借用鮑則岳（William G. Boltz）所提出「文本構件」（textual building blocks）的概念，每一個主題單元都包含不同數量的「構件」。³⁵ 譬如單元 C 有兩個明顯不同的文本構件，可以通過特定的句子結構和用韻來區分³⁶（前者的「與」[*laʔ]、「助」[*dzrah] 及「輔」[*baʔ] 三字押魚韻，後者的「郊」[*krâu] 及「沼」[*tauʰ] 同押宵韻）。³⁷ 互見重出的頻率如此之高，似乎印證了鮑則岳的觀察：「從現有文獻的寶庫中取資，並按情況所需加上新撰材料，這種編寫文本的做法似乎不止『在古代中國』廣為流行，甚至可能是常態。」³⁸ 《文子》的文本往往有別於其

35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70.

36 有關《文子》的用韻，見江有誥：《音學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99-210。

37 本文的上古音擬音採用了許思萊（Axel Schuessler）的「最低限度上古音構擬」（Minimal Old Chinese，簡稱 OCM，參見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對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所提出、普遍為西方學界接受的上古音系構擬多有補充發明。有關高本漢的上古音系，見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中譯本見潘悟雲等編譯：《漢文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年）。

38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70.

他文獻，也支持了方破（Paul Fischer）的論斷：在中國上古哲學文獻裡，借來的材料「往往被有意改動，以期符合新的語意脈絡並印證新的觀點。」³⁹ 套用到《文子》的個案裡，作者要印證的觀點顯然是君主唯有隨順道和德，方能治國。

鑑於相關引用文獻在流通程度和地位上互有差別，引用它們可以說是出於幾種不同的考量。例如，當相似的文句涉及（數種）名不經傳的文獻來源時，主因大有可能是貪圖方便，襲用既有的文字。不過對於引用《老子》，以及可能引及的《荀子》，⁴⁰ 目的似乎是借助有份量的權威文獻來引以自重。⁴¹ 《文子》作為一篇漢初形成的道家文獻，卻引及了儒家名著⁴² 實在很值得注意。另外，其對《老子》的處理迥異於兩部早期最著名的解《老》之作——《韓非子》⁴³ 和《淮南子》。總之，《文子》的互文關係在本質上

39 Paul Fisher, "Intertex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Master-Texts: Shared Narratives in *Shi Zi*,"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22.2 (2009):34.

40 《老子》盛行於漢初早已是中國學術史的常識，不過同一時期《荀子》的影響力也達到了高峰。詳見 Knoblock, *Xunzi*, 1:39.

41 這點對應了方破所提出重文出現的成因二及三，見 Fisher, "Intertex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Master-Texts," 9.

42 從郭店楚簡 五行 及《孝經》的例子可見，《荀子》並非簡本《文子》唯一引用的儒家文獻。

43 有關《韓非子》引《老子》，參見 Sarah A. Queen 桂思卓, "*Han Feizi and the Old Mas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of Han Feizi Chapter 20, 'Jie Lao,' and Chapter 21, 'Yu Lao,'*" in *Dao Companions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 ed. Paul R. Goldin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200–5.

似乎比以往推斷的要複雜得多。⁴⁴

至於上引段落的結構，只有單元 D 和 E 可以借助殘簡為傳世本的編排方式提供一定理據。從其餘例證可見，傳世本並未如實反映文獻最初的面目。以單元 B 及 C（第 11 行）的連詞為例，傳世本是用「積道德」一語過渡，但簡本卻沒有這個連接用語。對此可以有幾種詮釋，如單元 B 談及「積」的一段最初是在文獻別的部分，後來才被今本編纂者插進此處。這種竄改痕跡亦可能見於單元 D，當中傳世本透過押職韻（德 [*tək]、賊 [*dzək]、得 [*tək]）來連接兩個「文本構件」，反觀簡本不單沒有利用韻腳來串聯二者，⁴⁵ 中間更多出「以〔六曰君〕」一語作分隔。

雖然在以上個案裡實在無法重構論證的宏觀結構，不過在個別單元的層面上仍可看出文本採用了多種修辭手法，如上述的平行句構及用韻來推展論證。當然，鑑於引用的外部材料如此密集，大多數論證策略似乎是隨文本材料一併借來。文中的反義平行即屬此例，以同一個前置介詞帶出語義對立的內容，形成強烈對比，例見第 6-7、10、20-21 及 25 行（如 6-7 行：「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在進入這種反義對舉論證方式的討論前，我想

44 譬如葉波在“Persuasion through Definition”一文提出，由於《文子》「與其他文獻的互文聯繫幾乎闕如」（頁 223），因此《老子》作為其外部文獻源頭顯得更形重要。

45 單元 D 構件二內的兩句似乎用之幽通韻來貫連（讎 [*du]，幽部；久 [*ku?]，之部）。

特別指出這段《文子》引文只有第 4-5 行沒有在其他文獻中找到重文。簡本相應的文句為：

0575 { 上有道 }⁴⁶ 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治矣。⁴⁷

這裡採用了連環句式，即上句的結尾在下一句開首重複，在漢語修辭學中稱為頂真⁴⁸（英語中稱為 sorites 或 anadiplosis⁴⁹），形式上可以描述為：S1 則 S2，S2 則 S3，S3 則 S4 等等。在中國古代諸子著作裡，頂真是一種常見的論證手法，有時可以一重重延伸出去，像《大學》這句名言：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⁵⁰

有關頂真格的特殊功能，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認為是讓「中國思想家對世界的不同面貌建立間接的關

46 花括號內是筆者認為簡本原來或有的文字。

47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 30。

48 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年），頁 345-346。

49 Richard A. Lanham, *A Handlist of Rhetorical Term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0.

50 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 3。

聯。」⁵¹ 將論斷的首尾串連起來（上文是由「知止」到「得」）固然是頂真的重要特色，但我認為不應忽視環與環之間構建的直接因果關係，因為這使語義層級得以形成，並讓前一環成為後一環的前提。定州漢簡 0575 號竹簡比不上《大學》的連環長句，它在說明達成「治」（S3）這個最終目的時只舉出兩個先決條件，即在上者要有道德（S1）和在下者要有仁義（S2）。這一條簡文的論證可以概括為：

$$S1 \rightarrow S2, S2 \rightarrow S3 \text{ (治)}$$

正如下文所示，《文子》作者在談到如何達成其政治目的時往往採用相似方式，提出有多少個所需條件和性質為何，這在全文俯拾皆是。

值得一提的是簡本《文子》殘篇中，有一支簡似乎是利用頂真作三層推衍論證，其中前兩個從句類似剛提到的連環句前提，分別之處只在採用了否定形式。簡文云：

2248 {上毋} 道德，則下毋仁義之心，下毋仁義之 {心，則亂。} ⁵²

⁵¹ Christoph Harbsmeier, *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vol. 7, pt. 1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 Joseph Need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82.

⁵²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 30。

假如我對這一行文字的重構無誤，單元 A 似乎包含一組反義對舉的論證（0575 對 2248），其中第二部分用上否定句式（有對毋），結尾則用反義詞（治對亂）。我們已看到《文子》經常使用反義平行，這裡通過否定來營造對立，頗為貼近耿幽靜（Joachim Gentz）所謂的「否定式平行句」（parallelism in the negative mode）。⁵³ 若 S4 確為「亂」，這段文字便可以表述成：

S1 → S2， S2 → S4（亂）

雖然不能肯定 2248 及 0575 號竹簡原本是否構成一個文本單元，不過其他殘簡蘊含更多（近乎）平行的句式，亦與治亂的問題相關。這裡舉一對竹簡為例：

0717 矣。故有道者立天下，則天下治
0695 〔治矣〕，毋道而立之者，則亂。故治
〔亂〕⁵⁴

53 耿幽靜舉了以下《孔子家語》一句作例子：「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間線為引者所加）見 Gentz, “Defining Boundaries and Relations of Textual Units: Examples from the Literary Tool-Kit of Early Chinese Argumentation,” 147.

54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 31。

文中大談治亂，可視為推斷《文子》成書時間的寶貴線索，因為這類論辯尤其常見於「戰國末期至漢武帝末年的文獻」。⁵⁵ 從以上例子可見，《文子》深明在位者有道是治世的主要先決條件。我認為本書中心思想跟治亂問題的關聯，正是該文本的論證策略最關鍵的元素。

總結本部分內容，我們可以確定《文子》是一部互文性重文高度集中的中國早期文獻。然而，「集百家於一身」並未妨礙文本開展自己的哲學思路，其旨歸仍在於將道和德的概念跟成功統治的問題連在一起。採用「否定式平行」似乎在文本裡起著重要作用，可以為文本的論證方法提供更多佐證。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比較簡單的例子，說明文本如何用正反對立論證作遊說手段。儘管如上所言，傳世本《文子》並未如實反映早期版本的內容和結構，但我們仍可借以嘗試重構文本中更為複雜的論證個案。

二、以反義平行論證

以下引文出自傳世本《文子·道德》篇，主要是圍繞御民之道展開的討論。這裡同樣可以分為幾個主題單元，我將用英文字母區分：

⁵⁵ Geoffrey Lloyd 羅界，"The Techniques of Persuasion and the Rhetoric of Disorder (*luan* 亂) in Late Zhanguo and Western Han Texts," in *China's Early Empires: A Re-appraisal*, eds. Michael Nylan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51.

文子問政。老子曰：

A	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
B	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⁵⁶ 無矜無伐。
C	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
D	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
E	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
F	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
G	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⁵⁷

簡本《文子》的相應段落為：

- 0885 平王曰。為正（政）奈何。文〔子曰。御之以道，□〕
- 0707 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以□□
- 2205 □〔言。平王曰。御〕
- 2324 □□以賢，則民自足，毋加以力，則民自
- 0876 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不養

⁵⁶ 《老子》五十八章，見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152。

⁵⁷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242-243。

- 0826 則民倍（背）反（叛），視之賢，則民疾諍，加之以||
- 0898 則民苛。兆民⁵⁸離散，則國執（勢）衰。民倍
- 0886 〔上位危。平王曰。行此四者何如。文子〕⁵⁹

跟上節的引文一樣，這一段《文子》亦可在其他文獻中找到相近的重文。下引《管子·幼官》一句非常貼近《文子》單元 A 和 C 的句式：⁶⁰

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
養之以德，則民合……。⁶¹

單元 C 談及君主施行的政策合乎道，人民亦會變得自足和簡樸，跟《老子》第五十七章頗為相似：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⁶²

58 此處從張豐乾校定本，將「兆」字斷入下句，見氏著：《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24。按「兆民」一詞在古漢語十分常見，故我將二字連讀。

59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30。

60 張豐乾首先指出，見其《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頁103。

61 黎翔鳳：《管子校注》，頁176。

62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150。

隨後一部分述及君主罔顧治國之道的後果(單元 E 及 F)，同樣可找到更多重文，最明顯是《老子》第三章的忠告「不尚賢，使民不爭」。⁶³ 其他文獻來源也不陌生：《韓非子》就人民背叛和怨上、⁶⁴「主失威」和「上位危」提出相似的憂慮，⁶⁵《管子》也用了「輕為非」(視為非作歹為小事)一語。⁶⁶ 不過如上所示，存在重文不就代表所涉及的文獻直接互相引據，畢竟不容抹煞大家徵引同一源頭的可能性。此外，跟其他文獻取得高度調和，並未妨礙《文子》作者表達個人的哲學觀點。單元 A 及 C 在呼應《管子》之餘，推衍出更為複雜的論證。

由於單元 B 深受《老子》影響並有指出自後人竄入，⁶⁷ 故此處置之不論；傳世本《文子》相關段落的邏輯組織可細分為四個步驟：

63 何志華等編著：《文子 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頁 149。

64 八說：「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見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頁 428。

65 外儲說右上：「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同上注，頁 325。

66 明法解：「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見黎翔鳳《管子校注》，頁 1215。

67 晁福林：定州漢簡《文子·道德》篇臆測，《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000 年第 2 期，頁 81；張豐乾：竹簡《文子》探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2 年），頁 40。

表二：傳世本《文子·道德》第13節的邏輯組織

一	A	御之以道， 養之以德，（職） 無示以賢， 無加以力。（職）
二	C	〔正論〕 御之以道，則民附， 養之以德，則民服， 無示以賢，則民足。（屋） 無加以力，則民樸。（屋）
	E	〔反論〕 不下，則離散，（元） 弗養，則背叛，（元） 示以賢，則民爭， 加以力，則民怨。（元）
三	D1	無示以賢者，儉也，（談） 無加以力，不敢也。（談）
	D2	下以聚之，（侯） 賂以取之，（侯） 儉以自全，（元） 不敢自安。（元）
	F	離散，則國勢衰，（微） 民背叛，則上無威，（微） 人爭，則輕為非，（微） 下怨其上，則位危。
四	G	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微）

從上可見，講者（這裡是老子）在第一步（單元A）點出了四個成功治民的準則，接著在單元C闡述這對人民的正面影響，是謂正論；其後在單元E展開了一段與單元C內容相對的反論，通過使用否定語句（如「養」對「弗養」），闡述沒有遵循四個治民之道將會在國民之間造成的惡果，並以反義詞道出跟單元C相反的內容。相關的正反義詞包括「附」和「離」、「服」與「叛」等；兩個文本單元亦用不同的韻腳區分，如單元C押屋韻（足[*tsok]、樸[*phrok]），單元E則押元韻（散[*sâns]、叛[*bâns]、怨[*?ons]）。

第二步正反立論的總體結構可以描述成：

$$S1 \rightarrow S2 (C) \quad \text{及} \quad S1 \rightarrow S4 (E)$$

其中 S2 與 S4 意義相反，而且如上例所示各自帶著四個從句；再加上對立的單元（C 和 E）不是互相緊接，而是插進了單元 D，使得相關論證充其量只能以書面形式展示，方能在每個文本構件之間來回閱讀，對已論證的地方作比較。

緊隨著反論的推展，我們可以看到洶湧的民情（S4）在單元 F 裡延續，並被指為造成國家和在上位者嚴峻處境的誘因（S5）。0898 號簡包含了單元 E 和 F 的內容，證明這段論證推展確實見於簡本。通觀全文脈絡，整段反論可以表述為：

$$S1 \rightarrow S4 (E), S4 \rightarrow S5 (F)$$

正如上節所舉的頂真例子，我們再次看到一條以三個元素構成、用兩個步驟完成的論證鏈。第一個元素（S1）同樣包含道與德的概念，第二個（S4）也談及下民的反應。最後，第三個元素談到這些對國家大勢的後續影響，並通過用韻——此處押微韻（衰 [*srui]、威 [*?ui]、非 [*pəi]）——加強文本的連貫性。

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這段文字呈現高度的組織性，所以當發現屬於正論的單元 C 和 D 之間的連接，跟屬於

反論的單元 E 和 F 結構並不一致，或多或少會感到意外。單元 D 包含兩個不同的子單元，其中一個（D1）是「無示以賢」和「無加以力」的界說，另一個（D2）則含有四個四言句。將單元 C 和 D 並列可以得出以下的印象：

C	D1	D2
御之以道，則民附	下以聚之
養之以德，則民服	賂以取之
無示以賢，則民足	→ 無示以賢者，儉也 ←	← 儉以自全
無加以力，則民樸	→ 無加以力，不敢也 ←	← 不敢自安

從中清楚看出傳世本在這個關節並不完全，單元 D1 顯然缺了兩個定義。⁶⁸ 通過比較現有元素，可以推斷餘下的定義應為「御之以道，下也」及「養之以德，賂也」。⁶⁹ 有意思的是前者可以在簡本《文子》別的地方找到：

2364 [仁]。文子曰：「口夫御以道者，下之也者⁷⁰

可以肯定「御以道者，下也」這個定義在書中起著重要

⁶⁸ 丁原植注意到此處少了兩個定義，但未有嘗試還原，見氏著：《文子 資料探索》（臺北：萬卷樓圖書，1999年），頁253。

⁶⁹ 已為張豐乾所提出，見其《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頁42。

⁷⁰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32。

作用，因為它把作品的宇宙學和政治層面連結起來。⁷¹ 不過，這句話似乎是在答文王問仁，所以（跟 D1 其他內容一樣）大抵不是列在單元 C 後面；與 D1 有密切關聯的 D2 亦然。假如文本單元（D）的原貌比現時所見更為完整，我們對原來的排列方式和內容可以說出甚麼？從反論的編排方式可見，這裡原來應有四句形容道德對國家的正面影響，亦即本章的真正命題。下簡的內容正好助成此說：

0876 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不養⁷²

顯而易見，「可以治國」一句應出現在進入反論（單元 E）之前，讓正論部分告一段落，所以應屬於第二步的最後一行。⁷³ 不少學者已對簡本《文字》這句話的原貌作出了臆測。⁷⁴ 不過我未能認同這些說法，因為個人認為它們都沒有把文本的平行結構考慮在內。我主張整段文字的邏輯結構應該是這樣：

71 「無示以賢者，儉也」一句亦如此。《文子》中相近的文句為：「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見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19。

72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 30。

73 張豐乾已指出，見其《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頁 25。

74 如晁福林以意校補為：「御之以道，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見定州漢簡《文子·道德》篇臆測，頁 81。張豐乾認為應改作：「行此四者，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見《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頁 42。

表三：簡本《文子》與傳世本〈道德〉
第 13 節相應段落的邏輯組織重構

一	A	御之以道， 養之以德，（職） 勿視以賢， 勿加以力。（職）	
二	B	〔正論〕 御之以道，則民附， 養之以德，則民服， 勿視以賢，則民自足，（屋） 毋加以力，則民自樸。（屋）	〔反論〕 不御以道，則民離散，（元） D 不養以德，則民倍反，（元） 視之賢，則民疾諍， 加之以力，則民苛。（元）
三	C	{ 民附，則…… } { 民服，則…… } { 民自足，則…… } { 民自樸，則 } 可以治國。（職）	E 兆民離散，則國勢衰，（微） 民倍反，則上無威，（微） 民疾諍，則輕為非，（微） 民苛，則上位危。（微）
四		平王曰：行此四者何如？ 文子……	

如以上例子所示，論證裡其中一句蘊含安邦治國之方，⁷⁵ 另一句則相反，構成一治一亂的反義平行。上文已指出，先秦諸子著作和哲學文獻經常運用反義平行，這種平行推論甚至可以「視為中國古代說理文的『預設

75 此文「可以治國」一句押韻，「國」字為篇中韻腳，在古本《文子》其他段落亦同。這點跟《黃帝四經》等漢初出土文獻有別，因為後者裡的「國」往往是後人所改，用以避「邦」字諱，所以大都不合全篇用韻情況。例見《黃帝四經·經法·六分》，《馬王堆漢墓帛書》，頁 49，行二二至二四。這或許說明《文子》成書於漢代，其時「國」已普遍用來取代「邦」字。

模式』」，⁷⁶ 反映「中國哲學論述的『二元思維方式』」(dualistic thinking)。⁷⁷ 能夠在各式各樣古代中國哲學著作，包括儒家⁷⁸ 和道家⁷⁹ 哲人的文章中找到反義平行句式，實在令人嘖嘖稱奇。不過，《荀子》有些段落「即使以先秦文章的標準以論」也呈現出「高度平行」，⁸⁰ 在議論範疇和對稱嚴謹方面正好與上引《文子》論證作一對照。以下是《荀子·正論》的例子。

	〔正論〕	〔反論〕
—	A 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上端誠，則下愿慤矣； 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D 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上偏曲，則下比周矣。

76 Andrew H. Plaks 浦安迪, "Beyond Parallelism: A Rethinking of Patterns of Coord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in Chinese Expository Prose," in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69.

77 Plaks, "Where the Lines Meet: Parallelis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0.1-2 (1988): 48.

78 如出土文獻 五行 及 性自命出 , 分別參考 Dirk Meyer, *Philosophy of Bamboo: Text and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70-130, 及梅道芬 (Ulrike Middendorf): 「情」的秩序——郭店性自命出、語叢二 以及相關先秦文獻中的語言與性情考,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2014年), 頁252-257。

79 《老子》首章曰:「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其微」, 最能用來說明反義平行。

80 A.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 254. 中譯本見葛瑞漢著, 張海晏譯: 《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

二	B	治辨，則易一， 愿慤，則易使， 易直，則易知。	E	疑玄，則難一， 漸詐，則難使， 比周，則難知。
三	C	易一，則彊， 易使，則功， 易知，則明， 是治之所由生也。	F	難一，則不彊， 難使，則不功， 難知，則不明， 是亂之所由作也。 ⁸¹

兩個文本在幾個方面甚為相似。跟《文子》一樣，《荀子》談到在上者的行為如何影響到在下者（第一步），在下者的情狀又如何影響到國家的安危（第二和第三步）。《荀子》也像《文子》般，通過使用否定詞（第三步中的彊與不彊、功與不功、明與不明）和反義詞（易與難）來作正反對比。另外，上一章談到的《文子》與《荀子》的重文恰恰出現在上引「正論」段落之前。鑑於研究者普遍持《文子》成書於公元前二世紀之論，⁸² 這些共通點可能說明《文子》作者不單以《荀子》為文獻來源，更可能從中受到啟發，借以構建自己的論證策略。

81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321-322。

82 王博：關於《文子》的幾個問題，《哲學與文化》第 23 卷 8 期（1996 年），頁 1911；何志華：《文子 著作年代新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7-68；Paul van Els, “The *Wenzi*: Cre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xt” (Ph.D. diss., Leiden University, 2006), 111-13；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頁 125；及 Fech, *Das Bambus-Wenzi*, 135-42。

三、反面定義

簡本《文子》的中反面論證有時是由反面定義開始，且大都採用「謂之無」的形式，如下列的例子：

- 0716 子曰：「君子之驕奢不施，謂之〔無德〕
 0874 茲謂之無仁，淫
 0591 踰節謂之無禮。毋德者則下怨，無
 0811 口立，謂之無道，而國不⁸³

將驕、奢和不施等概念（0716 號簡）統歸於無德之下，而不說「謂之怨」⁸⁴之類，可見作者刻意將討論集中在德，旨在強調其重要性；其他地方提出無禮、無仁和無道等亦然。從 0591 號簡可見，在簡本裡反面定義之後緊接著析論，說明缺乏某種素質將對臣下造成甚麼影響。雖然這些定義不見於傳世本，但析論部分仍有跡可尋：

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
 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

83 以上散見於 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頁 33、31 及 29。

84 值得指出的是，賈誼《新書》收錄了漢初最重要的哲學名詞，包括其定義和反義詞。有關該書的文本、分析和英譯，見 Rune Svarverud 魯納，*Methods of the Way: Early Chinese Ethical Thought* (Leiden: Brill, 1998)。

亡者，未之有也。⁸⁵

我們可以借助傳世本，嘗試重構簡本此節的論證推展：

一	君子之驕奢不施，謂之無德， { } 茲，謂之無仁， 淫 { }，謂之無義， { } 踰節，謂之無禮。
二	毋德者，則下怨， 無 { 仁 }，則下諍。 無義，則下暴。 無禮，則下亂。
三	四 { 經不 } 立，謂之無道， { 無道 } 而國不 { 亡者，未之有也。 } ⁸⁶

分作三個文本構件後，這種頗具特色的文章編排方式再現眼前，凸出了國家的治亂興亡（三），完全取決於君主（一）和臣下（二）的相互影響。

這一段新重構的反論，可以在傳世本同一段落中找到對應的正論。文章一開頭是對「德」、「仁」、「義」和「禮」的正面定義，構成了這段論證的第一步，這裡因文繁不引。接下來是：

⁸⁵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25。

⁸⁶ 另參晁福林對此節的構擬，見 定州漢簡《文子·道德》篇臆測，頁 76。

二	故 修其德，則下從令， （耕） 修其仁，則下不爭， （耕） 修其義，則下平正， （耕） 修其禮，則下尊敬， （耕）
三	四者既修，國家安寧。 ⁸⁷ （耕）

不難看出論證的整體推論方向是由「四德」的定義（一）開始，接著是修此四端對教化臣下的影響（二），最後以四者修則國家安寧一語作結（三），與簡本中發現的反論平行。正論部分儘管在定州漢簡找不到具說服力的對應文句，但推斷簡本《文子》此處用了兩段對稱的反義平行論證似乎尚算合理。

結語

總結而言，我們看到《文子》作者在著書時主要面對幾項工作，包括挑選、調整和組合不同的「文本構件」，務求生成一個概念高度統一的文本，凸顯道、德兩個概念的重要性。為加強說服力，著作很大程度由兩條對立並對稱的論證線索構成，因為這種論證方式可用來強調，除了服膺文中所定的主要行為準則外別無他法，而一旦偏離了這些準則，將導致國家混亂與君主失勢。從上舉例子可見，論證的具體內容大都與國君及國民相關，我們從中可以體認到作者充分認識民心所向將直接影響國家的安危，

⁸⁷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25。

並將社會因素納入於其道論之內。

反義平行可謂原本《文子》最主要的論證特色之一，在傳世文本中卻以支離破碎和歪曲失實的形式呈現出來，對此我們可以怎樣解釋？這是後世編纂者的責任，還是文本落在其手中時早已殘破不全？上文已指出簡本《文子》近三分之二內容並未重見於傳世本，似乎證明第二個可能性較大，因為傳世本編者故意摒棄如此豐富的內容並不合理。⁸⁸ 不過，通過比較傳世本《文子》及其主要源頭《淮南子》，⁸⁹ 可以發現前者往往刪節或曲解後者的關鍵論證元素，以致文句扞格難通。⁹⁰ 因此，傳世本《文子》的「底本」完全有可能更為完整並編排有法，到後來才遭到重編和竄入其他文獻。柳宗元 辯《鶡冠子》 的名句：「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正好套用到今本《文子》身上。造成傳世本「歪曲失實」的原因至少有兩個：文本資料在傳世過程中大量流失，以及對餘下文本的編輯「失當」。

《文子》平行、對稱並有序展開論證的文字十分有特色，風格跟相傳為文子老師的老子大異。《老子》出奇地缺乏結構，以至劉殿爵這樣的知名學者也不得不說，此書「不過是一部篇章的合集，共通點只是思想傾向一

88 Paul van Els, "The *Wenzi*," 169–70.

89 有關二書的詳細比較，見丁原植：《淮南子 與 文子 考辨》（臺北：萬卷樓圖書，1999年）。

90 Barbara Kandel 坎德爾，*Wen Tzu – E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und zum Verständnis eines taoistischen Texte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73), 93ff.

致。」⁹¹ 儘管對該書論證特點的新近研究已有力證明這種觀點陳舊過時，⁹² 我仍然認同漢斯—格奧爾格·梅勒 (Hans-Georg Moeller) 的說法，即「如果分開閱讀各章，或者線性地閱讀此書，文本封閉難解的性質依然不變」。要理解《老子》這部書，唯有仔細審視文中的意象，並順著意象之間的內部指涉閱讀。⁹³

因此，雖然有大量證據證明《文子》在微觀層面上明確運用《老子》的技巧，如襲用《老子》風格的四言韻文，⁹⁴ 但在宏觀層面上，它對論證的處理則頗受另一重要先秦文獻影響——《荀子》。該書並不認為文理兼備的著作是「文飾」，而視之為「郁郁乎文哉」的周初文化遺產的體現和

91 D.C. Lau 劉殿爵, trans., *Tao te chi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4.

92 William H. Baxter 白一平, "Situating the Language of the *Lao-tzu*: The Probable Date of the *Tao-Te-Ching*," in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eds. 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Fargu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231–54; Rudolf G. Wagner 瓦格納,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62–96 (中譯本見瓦格納著, 楊立華譯:《王弼 老子注 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9年], 頁 57–92); Joachim Gentz 耿幽靜, "Zwischen den Argumenten lesen. Doppelt gerichtete Parallelismen zwischen Argumenten als zentrale Thesen in frühen Chinesischen Texten," *Bochumer Jahrbuch für Ostasienforschung* 29 (2005): 37–40.

93 Moell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Daodejing*, 6–10.

94 David Schaberg 史嘉柏, "On the Range and Performance of *Laozi*-Style Tetrasyllables," in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99.

呈現媒介。⁹⁵ 我在別處提出「文」亦是簡本《文子》的中心思想，甚至主人公文子也以之為名，反映這個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在此作一總結：《文子》對「文」的理解雖與《荀子》不同，但仍然有證據支持兩書之所以採用富於文理章法的論證策略，是試圖令形式和內容取得一致，使其教誨發為言辭時達到文意合一。

95 Schaberg,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0.